

# 从上海滩到晋察冀:田间诗歌创作的“大众化”转型

吴昊

(廊坊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

[摘要]如果说田间在上海光华大学的求学生涯及其加入“左联”的经历是其“大众化”诗歌创作开端,那么,跟随西战地服务团来到延安、进入晋察冀则是田间诗歌转型的契机。在晋察冀,田间认真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下乡工作中与百姓有了更为密切的接触。正因为如此,田间对诗歌“大众化”的理解更为深入,他的创作也彻底实现了“大众化”的转型。

[关键词]田间;民间歌谣;诗歌“大众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0)04-0076-10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0.04.011

From Shanghai Beach to Shanxi-Chahar-Hebei: The Transformation to "Popularization" in Tian Jian's Poetic Creation

WU Hao

(School of Literature, Langfang Normal University, Langfang, Hebei 065000, China)

**Abstract:** If Tian Jian's academic career in Shanghai Kwang Hua University and his experience of joining the "Left League" were the beginning of his "popularization" in poetry creation, it was an opportunity for Tian Jian to transform his poetry to follow the western battlefield service group to Yan'an and enter Shanxi-Chahar-Hebei, where Tian Jian carefully studied *The Forum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Yan'an* and had closer contact with the common people in the work of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Because of this, Tian Jian understood poetic "popularization" more deeply, and his creation has completely transformed to "popularization".

**Key words:** Tian Jian; folk songs and ballads; poetic "popularization"; transformation

1949年,田间曾在给胡风的信中写道:“按我半生生活说,上海的生活是我的第一良机,能到临汾和延安是我的第二良机,下乡工作是我的第三良机。如此半生,良机三有,今后的路,大概不会恰恰有一个恶运以终局。”<sup>[1]</sup>从田间前半生的生平来看,他提到的三次“良机”正是其人生的三个转折点,每一次转折都促使他对诗歌创作进行新的思考。如果说田间在上海光华

大学的求学生涯及加入“左联”的经历是其诗歌创作的开端,那么,跟随西战地服务团来到延安、进入晋察冀则是田间诗歌转型的契机。在晋察冀,田间不仅作为随军记者亲临战场,还在认真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后主动下乡工作,与百姓近距离接触。因此,田间对诗歌“大众化”的理解更为深入,他的创作也实现了“大众化”的转型。

收稿日期:2020-05-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7JJD750002)

作者简介:吴昊(1990—),女,山东泰安人,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

## 一、光华岁月，“左联”三年：田间创作的开端

田间原名童天鉴，安徽无为为人。他的童年虽在农村度过，但家庭却颇为富裕，并非贫农出身。田间后来在自述中写道：“我家在南方，算是一个中小地主，有租地，还有自耕田三十多亩。”<sup>[2]</sup>田间的父亲读过书，是个“书生”，为田间请了教《诗经》的私塾老师，还买回过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的新文学作品。而等田间稍大一些后，注重教育的家人又送他去“英、汉、算”三科都有教员的王家私立小学读书，在那里，田间第一次接触到了郭沫若的新诗。总之，田间从小就接受了中国古典与现代两种文学的熏陶，为其后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打下了基础。

田间的初中生活先后在无锡辅仁中学和南京安徽中学度过。在安徽中学时，他读到了蒋光赤《少年漂泊者》等早期左翼书籍，参加了抵制日货的活动，并第一次目睹了共产党爱国志士被押赴刑的场面，这使得他年轻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但此时田间还没有将爱国情怀转化为文学作品的创作才能，按他自己的话说，是“还没摸着门路”。这种状态直到其1933年从芜湖中学高二跳级、被上海光华大学录取后才得到改变。据田间讲述，他在光华大学学的是英语专业，但据其大学好友马子华回忆，田间报考的是政治系，辅系是社会系。马子华的说法能够从田间在光华大学社会学会所办刊物《社会月刊》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诗经之社会进化观》《中国女权运动的道路》（均署名童天鉴）中得到证明。在马子华看来，田间是一个“早熟”的人，他不仅有了“文学应为政治服务”的想法，而且“思想很明确与进步”，叛变了其“地主的公子”的阶级，站在劳苦大众一边，要求以革命行动来改变旧社会<sup>[3]</sup>。可见，田间虽然家庭条件较为优越，但他在农村生活的经历以及对《少年漂泊者》等左翼书籍的阅读，使其逐渐产生了对大众的同情，并开始接触革命。

1934年，通过同学欧阳弼（蒋弼）的介绍，

田间、马子华、刘宗璜三人加入了光华大学的“左联”小组，正式参加了革命活动。当时马子华已经出版了诗集《坍塌的古城》，在其影响下，田间也尝试写作诗歌，并开始用“田间”这个笔名发表作品。目前能查证到的田间第一首正式发表的诗歌，刊登在中国诗歌会所办刊物《新诗歌》1934年第2卷第1期上。这首名为《坏傻瓜》的诗歌模仿了民谣，在刊物目录中也备注为“谣”，虽然语言还较粗浅，但已经能看出田间同情穷苦百姓的阶级立场与“大众化”的诗歌语言倾向，这种倾向与中国诗歌会的倡导是一致的。此后，田间又在《新诗歌》上发表了《午夜工》《故乡》《雪夜逃荒者》等诗作，并交替用“田间”“天涧”“童天涧”三种笔名，在《京报》《诗经》《光华附中半月刊》等报刊上发表诗歌。这些诗作基本都具有“大众化”倾向，与中国诗歌会的宗旨一致。中国诗歌会的主要成员，如蒲风、柳倩、溅波等，也与田间保持了密切的交往，他们于1935年组织了“每月诗歌社”，由田间（用的是“天涧”这一笔名）主编社刊《每月诗歌》。田间的第一本诗集《未明集》也是以该社的名义出版的，为“每月文库之一”。田间曾寄给鲁迅这本诗集，鲁迅在1935年12月12日的日记中曾提及此事。

《未明集》的出版使田间的诗名迅速在上海滩传开，甚至传播到了日本。在日留学的胡明树用日语翻译了田间的诗，1936年1月10日的《留东新闻》（郭沫若主编）也曾有书评称赞田间是“一个时代的歌手，是一个有前途有希望的歌手”，并认为田间的诗风与艾青很相似<sup>[4]</sup>。田间与艾青此时已经相识，他曾建议“新诗歌丛书”出版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一书，鲁迅还打算为“新诗歌丛书”写一篇总序，但因故没有实现，后来艾青又自费出版<sup>[5]</sup>。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田间加入光华大学“左联”小组后，结识了很多活跃于上海的左翼作家。也正是在这时，田间认识了他创作道路中重要的引路人之一——胡风。1936年，田间拿到第二本诗集《中国牧歌》的校样后，便是聂绀弩将校样交给

胡风,由胡风写的序。胡风热情地赞美了田间“战斗的小伙伴”的姿势,同时也直接指出田间《中国牧歌》中存在的缺点:“气魄雄辉有余,但作品内容底完整性在许多场合却没有获得”,“每首充满着一个字一行两个字一行的形式”<sup>[6]</sup>。与胡风的评论类似,袁勃也指出了《中国牧歌》的优点与不足:“田间正是作为目前时代喇叭的诗人”,“主题的积极性要粉碎一切形式主义的老套,但弄成一字一行,两行一首,我是认为不妥的”<sup>[7]</sup>。田间出版于1936年的长诗《中国农村底故事》也存在与《中国牧歌》类似的缺点,他的另外一位文学引路人茅盾,在《叙事诗的前途》中有所提及:“这样的‘去!XX,X;’接连有百余,而同样的手法,全书里别处还有的是,我以为不好;并且一字二字成行,多数是不必要的。”<sup>[8]</sup>

这些批评都说明,田间虽然试图在《中国牧歌》《中国农村底故事》中直接抒写农民的苦难,但由于形式方面的经验存在一些不足,因此这两本诗集并非成熟之作。田间对师友们的批评表示赞成,他在后来的自述中提到:“对于新诗,我主张提倡大众诗风,而当时,我离这一要求还是有不小的差距。”<sup>[5]</sup>田间加入光华大学“左联”小组之后,虽然也经常参加写标语、发传单、示威游行、到工人棚户去演说和宣传等实际的革命活动,但由于他的学生身份,此时他还没有真正深入到农民、工人的生活中去,缺乏“现实的锻炼”。田间在光华大学“左联”小组的活动还是以发表诗作、编辑刊物为主。1936年是田间收获颇丰的一年,他不仅出版了两本诗集,还在《前奏》《夜莺》《现实文学》《诗歌杂志》《中流》等上海知名左翼刊物上发表了众多作品,并担任大型文学杂志《文学丛报》的发行者,鲁迅、郭沫若、周而复、臧克家等知名左翼作家都曾为此撰稿。鲁迅为白莽遗诗《孩儿塔》作序言及《我要骗人》《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等重要文章都发表在《文学丛报》上。因为刊物影响较大,受到当局注意,发行第五期后《文学丛报》便停刊了。

光华大学的求学岁月及上海的左翼文学氛

围,为田间的诗歌创作与编辑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使得他结识了一大批左翼文学的“同路人”。但田间并没有为在上海滩所赢得的“时代的歌手”“时代喇叭的诗人”等名誉而沾沾自喜,他了解自身在诗歌“大众化”方面的不足之处,像高尔基笔下的“海燕”一样,他渴望接受暴风骤雨的洗礼。

## 二、参加西战团,宣传“街头诗”:田间在临汾、延安

田间的《中国牧歌》《中国农村底故事》两本诗集曾委托上海杂志公司代售,但不久便遭到当局查禁。为了继续进行诗歌活动,1937年初,田间决心到东京去。他在东京写下了《今日的诗》一文,预言“伟大的暴风雨在降临着,伟大的诗篇在开始着”,认为“长篇叙事诗、讽刺诗、歌谣”是未来新诗发展的方向。但他还未见到胡明树与郭沫若,就听到从国内传来的“七七事变”的消息。因此,田间又立即返程回到上海,并在茅盾的鼓励下准备到武汉去,伺机北上去往延安。在去武汉之前,田间还在茅盾主编的《烽火》及王亚平主编的《高射炮》上发表过诗作,算是与上海以及光华岁月作最后的告别。

在武昌,田间与艾青、胡风等作家仍然保持密切联系,并开始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发表诗歌。他的代表作《给战斗者》便发表于《七月》第6期。据田间回忆,他当时住在武昌的一家小旅馆里,在一个夜晚,一气呵成写成《给战斗者》:

我之所以能写这首长诗,是因为我已经在上海参加了革命组织左联的缘故。当时,我已受过一些革命的教育,读过一些革命的书籍。我还读了大量诗作,中国的我不说了,以外国的说,普希金、涅克拉索夫、裴多菲、海涅以及马雅可夫斯基等的作品,我都读过一些。尤其是马雅可夫斯基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的名言“诗到广场去”,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忘记的<sup>[9]</sup>。

写完诗歌《给战斗者》的第二天早上,田间

送给艾青阅读，艾青边读边露出笑容，读完后，他对田间说写得真好，建议马上送到《七月》发表。胡风读到后也说：“马上在《七月》上发稿，发头一篇。”<sup>[5]</sup>就这样，《七月》发表了这首《给战斗者》，同名诗集于1943年由桂林的南天出版社出版，为“七月诗丛”之一。

过了不久，田间便与萧军、萧红、聂绀弩等左翼作家一起，应臧云远之邀，从武昌出发，前往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授课。在临汾的经历，可以说是田间人生中的又一个转折点，因为他在此地遇到了戈矛、袁勃等已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西战团”）的战友。西战团于1937年8月12日在延安成立，负责人是丁玲。田间有意加入这个组织，到延安参加革命活动，他在1938年2月18日给胡风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一想法。几十年后，田间这样回忆初次见到丁玲的场景以及其加入西战团的过程：

西战团丁玲团长，是一位乐观者，平易近人，性格爽朗，头上戴有八角帽，身上披着缴获敌人的军大衣，双腿裹着灰布绑腿，满面笑容，笑哈哈地说，“田间你来啦”。不久，我也就穿上八路军的军装，袖子上戴着“八路”两个字，作为一个战地记者<sup>[10]</sup>。

穿上八路军的军装，戴上“八路”袖章，田间似乎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变，也打破了丁玲对“诗人”的成见：

老早听到过田间的名字，说是一个“牧歌诗人”。既然已经是诗人了，我就不特连做诗的人不想见，纵是诗也愿意暂缓拜读。因此田间在我始终是很生疏的。当然这是因为我对他有成见。成见是要不得的东西，却不是无来由的东西。我并非对“田间”有成见，也并不是对年纪轻写诗的人有成见，是因为有过一些不知怎么就出了一点名的人，这些所谓诗人的，小说家的，就顶上那眩人的桂冠，满身也不忘记时时放射着艺术风味，实际还是“司丹康”和“法兰绒”

西装，于是趾高气扬，倘徉过市。但不久之后，这些所谓诗人艺术家也者的，又不知到什么地方丢了，这样经过几次之后，无形之中我便有了一点成见<sup>[11]</sup>。

丁玲是左翼作家中最早来到延安的，也较早地完成了“大众化”的思想转变。她对于田间的“成见”，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她对“司丹康”和“法兰绒”西装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文人气质的反感。田间虽然早就想成为一个“大众”诗人，但由于“光华大学有教会学校的传统与遗风，加之‘小开’‘少爷’不少，大家都穿西服”，所以田间“也穿起漂亮西装来了”，并且“西服多而考究”<sup>[3]</sup>。“穿西装”所象征的“小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恐怕是田间短时间难以改变的。即便他将“漂亮西装”替换为“灰军装”，丁玲在最初见到田间的时候，依然对他的思想动机与工作能力都不够信任，经过了一番考虑之后，她才在临汾同意田间加入西战团的请求。实际上，田间也在努力适应这种转变。初来西战团，他“克制着自己同许多个性并不相同的人相处得很好”<sup>[11]</sup>。尽管有些同志一开始对他“另眼相待”，甚至说他“不接近群众，不求健康”，但田间一直留心团里的活动，争着做“劳苦吃力”的工作，希望将自己真正融入这个群体中去。

加入西战团后不久，田间便跟随队伍到达西安，在此地停留了三个多月时间。一有空暇，他便抓紧时间写诗。他将西战团行军的经历写成了一本诗集《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卫们》，在汉口的生活书店出版，丁玲为其作序。这本诗集具有“速写”性质，田间试图写新的人物、新的生活，“拥抱了具体的人物或具体的生活事件的精神境界”（胡风）。这本诗集给予很多向往延安的青年以鼓励，比如贺敬之便回忆道：

是田间的诗歌给我增加了力量，使那时的我——一个16岁的少年更加勇敢和急切地同伙伴们一起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在大西南到大西北的艰险道路上，我确是怀揣着并默诵着田

间的诗集《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位们》，自己也一步步地在大西北的大风沙中奔走向前的。与此同时，我也用小纸片悄悄地写上自己的关于大风沙、关于自己正向神圣的“岗位”奔去的稚拙的诗句<sup>[12]</sup>。

西战团的经历不仅促使田间写下了诗集《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卫们》，他还在《七月》《少年先锋》《烽火》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诗歌。并且，田间在 1938 年 5 月 4 日给胡风的信中写道：“最近，我在想实实在在地汲取活的语言，写成民谣风的诗。这是一部分的尝试，并非整个路线，而且已经这样动手了。”<sup>[1]</sup>这首民谣风的诗，指的是初稿写于 1938 年 5 月 31 日的长诗《她也要杀人》（后改名为《她的歌》）。田间在该诗中塑造了一个名叫“白娘”的女性形象，敌人杀害了她的儿子，焚烧了她的家园，她也受到精神与身体的双重侮辱。为了报仇，白娘持刀疯狂地冲向田野。田间在诗歌末尾替白娘喊出了内心的呼声：“刀子不死，人民不死”。他尝试着用叙事的手法，将“白娘”所遭受的苦难与复仇心态描写得淋漓尽致。这可谓是田间创作的一次突破，他不再吟唱“牧歌”，而是在心灵深处真正与人民拥抱。胡风很欣赏长诗《她也要杀人》，把它作为“七月丛书”之一，于 1947 年出版。当然，从《她也要杀人》中，的确能看出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影子，这恐怕是田间建国后修改该诗的原因之一。

经过长途跋涉，田间一行终于抵达延安。这是田间心中的革命圣地，他为光明而欢呼。在延安，田间遇到了很多“革命的小伙伴”，如魏巍、天蓝等人。有一天，田间遇到了柯仲平，与他谈起西战团的戏剧改革，也谈起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的“罗斯塔之窗”，他们不禁发出疑问：中国的新诗往何处去？怎样才能真正实现诗歌“大众化”？经过讨论，田间和柯仲平决定发起“街头诗”运动。1938 年 8 月 7 日，延安的大街上，一幅写着“街头诗运动日”的红布高高挂起，田间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

不久，几乎是片刻之间，城门楼旁、大街小巷，写满了街头诗，诗传单。我大致还记得的，有柯老的《告同志》，以及其它许多墙头诗作。我自己，由于是发起人之一，自然也义不容辞，即兴挥毫，写了不少的街头诗，诗传单，有的写在墙上，有的写在红绿纸上，贴在墙上，如《毛泽东同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呵，游击司令》《义勇军》等。……这些诗，写在墙头或贴在城门楼旁以后，马上便围上一群人，有手执红缨枪的，有手持纪念册的，有牵着山羊的，有嘴含大烟锅的，都在看，都在念。还有的急匆匆地抄在他的本本上<sup>[10]</sup>。

街头诗短小通俗，往往只有几行，但却能用富有鼓动性的语言激发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西战团到达之前，延安已经有了街头诗的实验，西战团到达之后，延安更是掀起了街头诗的热潮。由陕甘宁边区文协战歌社（柯仲平、林山等）和西战团战地社（田间、邵子南等）联合发表的《街头诗歌运动宣言》中写道：

在今天，因为抗战的需要，同时因为大城市已失去好几个，印刷、纸张更困难了，我们展开这一大众街头诗歌（包括墙头诗）的运动，不用说，目的不但在利用诗歌作战斗的武器，同时也就是要使诗歌走到真正的大众化的道路上去，不但要有知识的人参加抗战的大众诗歌运动，更要引起大众中的“无名氏”也多多起来参加这运动<sup>[13]</sup>。

虽然难以避免标语、口号之嫌，但在提高大众的抗日积极性，使大众真正走近诗歌等方面，延安的街头诗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也成为街头诗的经典作品，从延安流传至晋察冀。1939 年春天，当田间等西战团成员来到易县南娄山附近时，田间看到村前有一座很大的古式牌楼，上面写着《假使我们不去打仗》这首诗，还配有大的插图<sup>[14]</sup>。

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街头诗已经深入晋察冀人民群众心中。而田间，也是从“街头诗运动”开始，投入到晋察冀根据地的文艺运动中去。在这块“亲爱的土地”上，田间基本实现了他的诗歌“大众化”理想。

### 三、“滹沱河上柳，高枝悬北斗”：田间“扎根”晋察冀

1938年秋冬之际，田间作为战地记者，跟随西战团渡过黄河，从延安来到晋察冀。比起延安，晋察冀的抗日斗争要更为激烈，街头诗的宣传也显得更加迫切。刚到晋察冀不久，田间、邵子南、曼晴、史轮等西战团“战地社”成员和丹辉、邓康、红羽等“铁流社”成员就于1939年1月在蛟潭庄发起了“街头诗运动”，用红绿纸书写街头诗，张贴在村头、墙壁等地方。很快，街头诗在晋察冀产生了较大反响，“战地社”油印的街头诗集《粮食》在晋察冀销售了七千份，其中就收录有田间的代表性作品《多一些》。“战地社”所编刊物《诗建设》以及《抗敌报》（《晋察冀日报》前身）都大力宣传街头诗。孙犁曾描述晋察冀边区“街头诗”创作的盛况：“这里没有数字，因为每个村庄墙头上都有了街头诗。如果要数字，那就是边区全部的村庄、全部的墙壁。”<sup>[15]</sup>这种盛况的出现，与田间等“战地社”成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除用“田间”这个名字之外，田间在晋察冀还以“中国人”“毕桑”等笔名发表街头诗，仅1941年冬“军民誓约运动”文艺创作评奖，他就有24首总题为《我是一个中国人及其它》的街头诗获奖<sup>[16]</sup>。田间热情地赞美街头诗：“街头诗把口号的内容，把许多故事都形象化了，诗化了，同时又以短小的，精悍的，明快的，象小匕首出现的各处，因而出现打倒敌人和动员群众及慰劳战士的明显作用。”<sup>[17]</sup>“它是大众的心血、热情、意志，经过诗人在神圣民族战争的疆场上所组织底刺刀。”<sup>[18]</sup>的确，田间在晋察冀的十年里，街头诗始终在动员群众抗日、生产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宣传作用，许多普通老百姓、战士也开始创作街头诗。街头诗真正

成为“大众化”的诗歌形式，田间功不可没。

1939年下半年，田间又面临着他人生中一次重要的选择：从西战团调出，到晋察冀通讯社任战地记者。和他一起同任的有陈辉、张帆、林采、邓康等人，孙犁这时也来到了通讯社，做内勤工作。从此，田间在晋察冀的创作活动，正式拉开帷幕。这时的他已经在思想方面完全成长为一个“战士”，他在1939年10月27日给胡风的信中写道：“至于我自己，一定要坚决站在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拼命。今天，既然在晋察冀，我就为晋察冀而拼命！”<sup>[1]</sup>除在《七月》《晋察冀日报》上发表诗歌外，作为战地记者，田间也创作了一些经典的通讯作品，如《最后的一颗手榴弹——出击正太线战役报告》。这篇文章首发于1940年10月14日的《晋察冀日报》，并且在1941—1942年期间，先后被《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新疆日报》等大报转载，其影响力可见一斑。战地记者的职业也使得田间有了更多直接接触战斗前线、访问八路军将领的机会。例如，1939—1940年间，田间曾先后访问过肖克将军（在野三坡）、贺龙将军（参加陈庄战斗）、杨成武将军（在黄土岭）、聂荣臻司令员（参加百团大战），见证了八路军在晋察冀的英勇战斗过程。后来，田间根据访问八路军将领的经历，写成了组诗《名将录》。这些诗作兼具诗歌与报告的性质，被田间称为“小叙事诗”。他抓住肖克、贺龙、杨成武、聂荣臻在战斗中的典型事迹，根据自己对将领们最突出的印象重点描写，使将领们的形象在诗中有了生动的呈现。

从单纯的抒情到叙事，是晋察冀时期的田间深入思考的诗歌写作问题。在《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卫们》《她也要杀人》等诗中已经具有了叙事元素，《名将录》可谓是田间叙事诗写作的又一次尝试。1940年上半年，田间根据自己在晋察冀的生活体验，写作了两部长诗：《亲爱的土地》（铁流社1940年5月油印出版）和《铁的子弟兵》（1941年发表于《五十年代》）。它们是边区最早出现的叙事长诗，诞生时间比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还要早五年多。前者有

3 500多行,讲述了晋察冀普通农民刘大发和妻子王桃积极参加抗战、保卫“亲爱的土地”的故事;后者有3 200多行,描述了放羊人邓兴发在其母“好老妈妈”的鼓励下参加子弟兵、英勇牺牲的故事。两者在人物对话、环境、民俗等方面的描写都具有晋察冀的地域特色,并且注意使用通俗易懂的口语来写作,在诗中还加入当时流行的抗战歌曲、民间歌谣等元素。诗歌《亲爱的土地》和《铁的子弟兵》诞生后,受到边区文艺界的一致赞赏,比如孙犁在总结1940年边区文艺活动时曾重点介绍了田间的这两首长诗:

《亲爱的土地》在形式上来了一个突破。诗人从生活上接近了边区的新人物,促使他重新考虑他的形式。作者企图以史诗的形式来记录时代的光彩,又写了《铁的子弟兵》。作者亲身接近着故事的主人,主人的遭遇给诗人以感情,于是像旋风般的韵律,预示着他的新形式的作品的诞生。

《亲爱的土地》记载了边区人民。《铁的子弟兵》叙述了边区的战士。而这是一样的。战士也就是人民,人民参加着保卫家乡的战斗。作者用王桃(《亲爱的土地》女主角),用牧羊人,用蝴蝶、水草、小鱼,画着边区的伟大人民。

作者在《亲爱的土地》中接触了人民的语言和感情。在《铁的子弟兵》中则运用了童话的精神,旋转着故事和节奏<sup>[19]</sup>。

何洛也充分肯定了《亲爱的土地》和《铁的子弟兵》两首诗歌:

《亲爱的土地》和《铁的子弟兵》,都是反映晋察冀现实的两个主要的侧面。只有在亲爱的土地上,才能产生铁的子弟兵,只有铁的子弟兵才能保卫亲爱的土地。诗人以时代的眼光来照耀出边区一新的家庭和新的人物之成长,以及群众怎样为保卫家乡和祖国而斗争<sup>[20]</sup>。

总之,《亲爱的土地》和《铁的子弟兵》的诞

生与成功标志着田间已经能够将晋察冀的生活经验成功地转化为诗歌创作,在诗歌“大众化”的道路上更进了一步。但田间对这两部作品还不是特别满意,尤其是《亲爱的土地》,他认为,这首诗在诗句的结构上还有一些和“群众相隔膜”,胡风也认为《亲爱的土地》存在形式方面的问题。所以,田间仍然在继续寻求诗歌与大众更好的结合方式。

田间在编辑方面的工作也在持续开展。1941年,田间被调到晋察冀边区“文协”,负责主编《晋察冀日报》的文艺副刊“晋察冀艺术”。该副刊共刊出42期,是“街头诗运动”的阵地之一,也是《晋察冀日报》持续时间最长的纯文艺副刊。田间曾在上面发表过《怎样写街头诗》《街头诗运动三周年纪念》等文章。针对当时文艺界重点关注的“民族形式”这一问题,田间和左唯央在“晋察冀艺术”上有过争论。除“晋察冀艺术”外,田间还主编过《晋察冀日报》的另一副刊“鼓”,以及文艺刊物《晋察冀文艺》和《诗》。1942年11月24日,田间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一首重要的长诗《祝山——为勇敢的人而作并献给十月革命节》,他在诗中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比作“山”,体现了其内心汹涌蓬勃的革命热情。

在晋察冀,田间仍在关注《七月》的出版情况,他继续为《七月》投稿,先后发表了《“烧掉旧的,盖新的……”》《多一些(街头诗小集)》《自由,向我们来了》《小叙事诗集》等诗作,也在桂林的刊物《诗创作》上发表过作品。他在给胡风的诗中写道,晋察冀有很多人盼望看到《七月》,他也希望能够出《七月》的晋察冀版。但此时的田间在“大众化”文艺思想方面与胡风的分歧已经初现端倪,并且随着田间诗歌创作的转型,这种差距还在持续变大。

四、学习《讲话》,深入民间:田间“大众化”理想的实现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应该到

群众中去，虚心向群众学习。《讲话》的主要思想很快传播到晋察冀，《晋察冀日报》上也发表了鼓励文艺工作者下乡的文章。同时，从延安到晋察冀，整风运动也开展起来。据田间回忆，1943年5、6月间，有一批同志，经过整风之后，都纷纷要求下乡。比如邵子南到阜平城郊当小学老师，在敌人秋季“扫荡”时，他与爆破英雄李勇一起，参加了爆破运动<sup>[21]</sup>。后来，邵子南根据这一经历写成了小说《李勇大摆地雷阵》以及诗歌《李勇要变成千百万》《李勇已变成千百万》。田间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1943年的夏天从边区文协下乡到孟平，担任县委的宣传部长。他真诚地相信《讲话》精神，并将《讲话》中的观念变为实际行动。在孟平，田间一直从事实际的群众工作，如征粮、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一待就是七年。这段经历对田间的影响尤为深远：“这对我的一生来说，就好比是：从此一棵小树栽到泥土里。”<sup>[22]</sup>他还把群众工作的过程当作自我的思想改造：

一个文艺工作者，尤其是缺乏群众斗争经验的人，只有到群众中把思想感情彻底改造一下，从一个旁观者的地位，真正站到主人翁的地位，像毛主席所指示的，作斗争中的主人，做事变中的主人，时刻站在斗争之中，并且是用显微镜和望远镜去观察生活，用马列主义武装生活，才有可能谈到创作<sup>[22]</sup>。

诗歌“大众化”是田间自参加“左联”以来的一贯追求，但只有当其学习了《讲话》精神，真正参加了群众工作后，他才真正体会到诗歌“大众化”的精髓：“诗，无论什么诗，必须到广大群众中来，面对群众，经受考验，才能有力量，才能受到群众的检验。”<sup>[23] (P128)</sup>正因为对《讲话》精神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所以田间在孟平积极向民间学习。与此同时，他之前的一些创作在大后方产生了强烈反响。比如孙犁1944年在延安寄给田间的信中写道：

闻一多教授在联大讲演称兄为“敲鼓的诗人”，他为“听鼓的”，推崇备至，盖重庆以国民党高压政策，反动政策，使人民呼吸困难，兄诗之风格，很有助于呐喊奋斗也。他刊物有评《给战斗者》谓长诗好，街头诗不好，仍是老调，例举一篇日本俘虏上吊为佳作，《援助这大山沟》为坏作。胡明树写一篇《忆田间》，但此文我未见。总之，在大后方，兄之诗，已转捩一般无聊者之猎猎矣<sup>[24]</sup>。

国统区的社会氛围较为沉闷，与晋察冀边区有很大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当闻一多读到田间的《给战斗者》时，自然是欣喜莫名。于是他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并在西南联大的唐诗课堂上向学生们诵读田间的作品《多一些》与《时代底舞》等。他还在其编选的《现代诗钞》中选了田间6首诗，足以见出田间的诗歌给他的震撼。闻一多对田间的宣传，使得田间的诗歌在大后方风靡一时，加强了人们对解放区的向往。正如冯至所说：“田间的诗在昆明诗歌爱好者的集会上，不断地被讨论、被朗诵。在讨论最热烈、朗诵的声音最高亢时，人们觉得战地的炮火，再也不是那样辽远了，仿佛就在自己的身边。当时我的印象是，田间给新诗增添了一种新的风格，这风格只有在战斗的生活里才能形成。”<sup>[25]</sup>在1939—1945年期间，“时代的鼓手”能够代表国统区对田间的主流评论，还有人称田间为“吹号角的诗人”（鲁矛），胡明树、吕荧在文章中也称赞了田间的诗作。

田间的作品之所以能在国统区传播开来，也和胡风的大力宣传有关。胡风曾为田间的《中国牧歌》写过序，闻一多所读到的诗集《给战斗者》，也是1943年胡风帮忙在桂林南天出版社出版的。因此，部分读者认为：“关于田间之出现诗坛，是要多谢胡风的极力推荐，有人说胡风以一个批评家的资格过分偏爱田间，遂至把田间偏见地提高起来了。”<sup>[26]</sup>田间发表在《七月》上的一些街头诗也曾遭受国统区读者的质疑：“我非常奇怪田间先生为什么毫不选择的把



一个完整的句子截成数段来安排。这样做,是为了加深印象吗?加重情感吗?抑是为了顾全形式呢?”<sup>[27]</sup>面对这些质疑,胡风专门在《七月》作出了回应,认为部分读者对田间的偏见是没有理由的:“他们所指出的田间的好处,并不能超过我所指出了的范围,他们所痛骂的坏处,也没有超过我所指出了的范围,而且比我说得更零碎,更不着实际。”<sup>[27]</sup>但胡风也没有完全偏袒田间,他认为田间是一个“还没有完成自己的诗人”,作品有缺点在所难免。然而,1943年之后的田间,并没有按照胡风所认为的“大众化”方向前进;他虽然还在创作街头诗,但其诗歌风格已经与“擂鼓”“吹号角”有了较大不同,已经把目光转向民间歌谣。在内容方面,田间积极书写晋察冀劳动人民、部队战士的事迹;在语言方面,田间认为要从民间歌谣、方言口语中汲取资源。如前文所述,田间在1930年代便已经进行了歌谣体的诗歌实验,但似乎不很成功,也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直到田间1943年后下乡,亲身体会了老百姓的生活、搜集大量晋察冀地区的民歌后,他才较为成功地将民间语言资源运用到诗歌写作中。并且,田间从小受过古典文学的教育,他也能在自己的写作中体现古典诗歌注重格律的特点。毛泽东曾为中国新诗指出过一条“古典”加“民歌”的道路,田间是这条道路较早的实践者,这与他《讲话》精神的真诚拥护是分不开的。从这个角度说,田间与李季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田间的成长经历毕竟要比李季复杂,所以他向民间学习的程度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过程。

在滹沱河边,田间主动深入群众的生活,结识了大坪村的支书张庆云。张庆云虽然是一个普通农民,但他喜欢诗歌,自己也尝试进行诗歌创作。在张庆云的建议下,田间在大坪村用诗歌进行群众动员,取得了理想的效果。田间还根据孟平劳动英雄康元、周二、刘海仁等人的经历,写成了《孟平英雄故事》,1944年由孟平县委编印出版。平时,田间经常与群众谈心,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逐渐取得了群众的信任。他曾回忆到孟平群众与他的深厚感情:“有时,有

些乡亲,见是我,便自动跑上来,抓住我的手,半天不放,而又一时说不上话来;而后,就谈个不休,还要把我拉到家里吃饭。”<sup>[23]</sup>1944年初冬,田间本可以跟随邵子南等西战团的战友一起回延安,但他却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边区的灵魂”,与当地的群众结成了“骨肉之亲”。

抗战结束后不久,田间及夫人葛文本准备随队伍到太原,但因为阎锡山的逆行倒施,田间等人又回到冀晋区。冀晋区党委这时要主编杂志《新群众》,杂志所在地在红土山,任命田间做主编。田间在那里创作了其学习《讲话》精神后较为成功的两部长诗:《戎冠秀》和《赶车》(又名《减租记》)。这两部长诗可谓是“双胞胎”,前者以“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为书写对象,发表于《新群众》上,后来又出了多个单行本;后者以田间参加的减租斗争为蓝本,发表于张家口创办的《长城》上。《戎冠秀》的初稿甚至得到了戎冠秀本人的肯定:

我到红土山不久,赶上群英会开幕,会外,我见到了戎冠秀,和这位老人、著名的拥军模范,叙谈了几次,又写了一篇《戎冠秀》初稿并请杂志社余素琪同志,为我朗读给老人亲自听一遍,征求她的意见。并告诉她,丝毫不必客气,有啥说啥!老人听完,慢慢地说:“我没啥意见,你们把我写得太好了。”

“你别客气,有什么不妥处,你尽管讲,我是你的小学生哩。”我说。

老人马上摇摇手,“我很喜欢的”,又望着我说,“你写好了,能不能送我一本?”

“当然要送的。我们的娄霜同志正在配画,刻木刻哩?”

提起这事,全国解放后,戎冠秀进京,参加大会,每见到青少年,她就说,“你们想知道我,看看田间写的诗。”<sup>[28]</sup>

戎冠秀虽然被授予“子弟兵的母亲”称号,但她毕竟还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文化水平与

知识分子不可同日而语;她能听得懂并喜欢听田间为她写的长诗,说明诗歌《戎冠秀》的确是通俗化、口语化的。1946年秋天,当田间从红土山调到雁北去时,路过一所民校,民校的墙上竟也写着《戎冠秀》长诗的全文。田间将《戎冠秀》取得的成绩,归功于其对《讲话》精神的学习。他改变了自己“与群众不相适应的感情”,并从写作内容、语言方面主动接近群众,至此,田间已经完全实现了向诗歌“大众化”的转变。

目前,虽然学界对田间建国后的创作存在褒贬不一的声音,但从其建国前创作的历程来看,他对诗歌“大众化”的追求无疑是执着的。从上海滩到晋察冀,从“左联”成员到共产党的干部,田间身份转换的过程,也是他创作方面不断追求“大众化”的过程。无论是街头诗还是叙事诗,田间一直在寻找与“大众”最相契合的创作点,最终他选择民间歌谣作为创作资源,写出了《戎冠秀》《赶车》等诗篇,实现了其“大众化”的理想。可以说,田间诗歌创作的“大众化”转型,体现了知识分子对民间的融入,在解放区诗人群体中最具有代表性,也体现了解放区“大众化”诗歌发展的趋势。

#### [参考文献]

- [1] 田间.田间致胡风的信[J].新文学史料,1995(3):177-183.
- [2] 田间.田间自述(一)[J].新文学史料,1984(2):50-57.
- [3] 马子华.我与田间在光华大学左联的活动[J].新文学史料,1998(3):76-79.
- [4] 马甦夫.田间的《未明集》读后感[N].留东新闻,1936-01-10.
- [5] 田间.田间自述(二)[J].新文学史料,1984(3):94-107.
- [6] 胡风.《中国牧歌》序[M].诗人社,1936.
- [7] 袁勃.评田间的《中国牧歌》[J].诗歌小品,1936(1):45-46.
- [8] 茅盾.叙事诗的前途[J].文学,1937(8):414-417.
- [9] 田间.《给战斗者》写作前后——答《诗刊》编辑部[J].诗刊,1981(1):52-53.
- [10] 田间.田间自述(三)[J].新文学史料,1984(4):104-111.
- [11] 丁玲.序《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冈卫们》[M].生活书店,1938.
- [12] 贺敬之.《田间诗文集》前言[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
- [13] 街头诗歌运动宣言[N].新中华报,1938-08-10.
- [14] 田间.田间自述(四)[J].新文学史料,1985(1):100-109,122.
- [15] 孙犁.1940年边区文艺活动琐记[N].晋察冀日报,1941-01-26.
- [16] 王剑清,冯建男.晋察冀文艺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
- [17] 田间.现在的街头诗运动[J].诗建设,1939(1).
- [18] 田间.怎样写街头诗[N].晋察冀日报,1941-05-14.
- [19] 孙犁.1940年边区文艺活动琐记[N].晋察冀日报,1941-01-26.
- [20] 何洛.四年来华北抗日根据地底文艺运动概观[J].文化纵队,1941(2):1.
- [21] 田间.田间自述(五)[J].新文学史料,1985(2):78-87.
- [22] 田间.纪念《讲话》发表十周年[J].人民文学,1952(6):16-18.
- [23] 田间.田间自述(六)[J].新文学史料,1985(3):128-142.
- [24] 葛文.整理.1944年孙犁在延安寄给晋察冀田间的信[J].新文学史料,2000(2):103-104.
- [25] 冯至.擂鼓和赶车[A]//田间.田间[M].白崇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1.
- [26] 白卢.评艾青与田间两本近作[J].中国诗坛,1939(3):11-12.
- [27] 杨云璈,胡风.关于诗与田间底诗[J].七月,1940(5):84-87.
- [28] 田间.田间自述(七)[J].新文学史料,1985(4):105-121.